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王安石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三峡武侯祠



27
9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王安石小传

张晓丽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 梁坚

封面设计 章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王安石 小传

张晓丽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0印张 1100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

*

ISBN7—80521—844—7/K·114

定价: 136.00元 (全20册)

目 录

- 一、立志经纶天下事 (1)
- 二、孜孜实干利民生 (9)
- 三、上万言力陈改革 (25)
- 四、握重柄厉行变法 (37)
- 五、“三不足”言震古今 (66)
- 六、唐宋大家擅文才 (84)
- 七、金陵退隐仍忧国 (92)

王安石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。北宋时期国弱民穷，王安石以惊人的胆略与才智发动了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——熙丰变法，像雷鸣闪电划破昏暗的长空。一石击起千层浪，改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有人惊惧咒骂，有人欢欣鼓舞，有人疑虑不定，守旧与变革，无为与有为对立交锋。这场新旧变革呈现一幅丰富的历史卷幅，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，尽管最后被强大的守旧势力压制而失败，尽管王安石此后受到不公正的歪曲诬蔑，但历史却是公正的，拭去覆盖历史真相的尘沙，王安石作为政治家、改革家的地位得以确定，他的功业、改革精神与高尚节操，对后世人都很有益的启迪。

一、立志经纶天下事

北宋真宗天禧五年（公元1021年）的11月，在秋风萧瑟、寒冬将至的气氛中，王安石出生在江西临江军（江西清江）的府内官舍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后封号荆公，祖籍为江西抚州临川。王氏一门是书香之族，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登进士后，开始

了王家的仕宦生涯。王安石的父亲王益，年少有才，17岁就有文名，22岁中进士，担任建安主簿。王益当时年少气盛，不阿权贵，比较恤民，当时建安（福建建瓯县）贫民不能按时交纳赋税，州官催逼到县，王益直言顶撞说：“有钱的人尚不按时交纳赋税，何况贫民！”命吏卒杖击豪强，限期交纳，百姓的赋税也交纳上来了，此举使乡绅豪富为之侧目，非常畏惧。但王益虽有才干，因秉性刚直，屡挫豪强，仕途一直蹭蹬不达，常遭排挤。在任临江军判官时期，因为上司勾结当地大姓豪绅不守法，王益遇事往往据理争辩，压制豪绅的横行霸道，以至豪绅们纷纷愿出钱要转运使把他调走。不久王益被调到新淦（江西新干）。后又调任新繁（四川）、韶州（广东韶关）等地，南来北往，仆仆风尘，虽然官低权微，但王益每到一处都坚持整治豪强奸诈之徒，为民作些有益的实事，很有清誉。另外王益不迷信鬼怪，不轻信道说人言。任知韶州时，属县翁源多虎患，于是下令捕杀，有人说老虎自杀死了五只，王益就命把虎头送到州府来，不因虎的“自杀”之怪异而惊诧。父亲的许多言行作为，对年轻的王安石有很强烈的影响，他后来专门作文纪念父亲，对父亲的作为充满敬佩和景仰。

王益不仅为官很刚正，也是一位疼爱儿女的慈

父。他有七子一女，对孩子们非常钟爱，从不发怒责备，总是和颜悦色，宠爱如掌珠。但父亲对孩子们并不是娇惯溺爱，而是循循善诱，加以教育，每当茶前饭后，公务之暇，他总是给孩子们讲忠孝仁义的大道理，做人的品格德行，并常讲古今治乱存亡的原因，勉励孩子们以国事为己任，做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业，使王安石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。

良好的家教，书香门第的熏陶，王安石幼年就爱读书。他天分很高，悟性强，记忆力惊人，诗书文赋往往过目不忘，博闻强识，写文作诗动笔如飞，不假思索，一气呵成，初看好像很不经意，文章写成后人们才叹服它的精妙绝伦，少年时就很有文才。

安石的父亲虽仕宦多年，但官低俸少，又比较清正，所以家境并不富裕，以至在老家临川未能购置田产养家。宋代官员迁调频繁，所以朝官们往往在家乡营建华宅丰田以安家，王益却清贫得在故园没有田宅可以过一天，只好带着一家人随任，仆仆于风尘中，因此，王安石从小就随父亲南北奔走，转游于宦途，到过不少地方，既有富庶秀美的长江流域，如江西的清江，庐陵等地，下游的南京、扬州；也有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西隅，如四川的新繁等地；甚而还有岭南蛮族瘴疠之地，如广东的韶州，也到过繁华的京师东京（河南开封），足迹遍及大半中国。气象

万千的山河风光，不同的民俗风情，开阔了王安石的眼界，陶冶了他的性情。少年的王安石对这种颠沛流离的旅宦生活不以为苦，反以为乐，恣情流连于大自然的造化之中，并常与朋友高谈阔论，吟诗作乐。他曾作《忆昨诗》，对少年生活作自述，诗云：

“忆昨此地相逢时，春入穷谷多芳菲，
短垣困困冠翠岭，踳躅万树红相围。
幽花媚草错杂出，黄蜂白蝶参差飞。
此时少壮自负恃，意气与日争光辉。
乘闲弄笔戏春色，脱略不省旁人讥。
坐欲持此博轩冕，肯言孔孟犹寒饥。
丙子从亲走京国，浮尘衮并缁人衣。”

芳菲满园的春色，花红柳绿，碧草青青，蜂飞蝶舞，几个少年恃才傲物，吟风弄月，豪放不羁，潇洒风流。只愿以华词丽章博以高官，对于世称圣贤的孔丘、孟轲什么安贫乐道了，却是弃之如敝履，更无心仿效。

这样诗意洒脱、恣情游乐的生活，到安石十六七岁时发生了变化，17岁时他的父亲又调任建康通判，佐理政务，王安石随父亲到江宁府（今南京）。在漫漫的水上旅程中，他在船上思绪不宁，追忆往昔，展望未来，这个17岁的少年猛然醒悟了往日纵情游嬉的荒唐，立志刻苦自励，作一名安邦

定国的治世能臣，他在行舟上写下这样的诗以自勉，诗云：

“明年亲作建康吏，四月挽船江上矶。

端居感慨忽自寤；青天闪烁无停晖。

男儿少壮不树立，挟此穷老将安归？

吟哦图书谢庆吊，全室寂寞生伊威。

材疏命贱不自揣，欲与稷契遐相晞”

江上一叶孤舟，一位少年端坐思索着人生，见日月运行如梭，年华易逝，意识到男儿少不立志有为，老而一事无成抱憾终生。因此他要刻苦读书，谢绝迎来送往的世俗事，也不再风流自赏，而是闭门攻读，钻研经纶天下的才学，学到商代贤臣伊尹的才干。虽然自谦才疏学浅，却以古代圣贤稷、契以自期，希望能像他们一样为民造福，光耀史册。

传说契是商朝的始祖，曾经辅佐大禹治水，卓有贡献。后稷是周朝的始祖，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，是尧舜时代的农官，他教民耕种，并发明种植稷、麦，被称为农神。他们都是传说中古代圣君尧、舜、禹的贤臣，是切实为民谋利的实干家。17岁的王安石仰慕他们，决意不以虚文博高官浮名，而是立志要学以致用，为民谋福，做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业。少年立志，奠定了王安石日后在改革路途上披荆斩棘、奋战不止的思想基础。

王安石既抱定经世致用的目标，立志不作腐儒书呆，而要学以致用，做一番实实在在的政治事业，他读书就有了新的境界，范围更加广泛，不再限于读诗、书、经、传和后代儒生们作的注疏，而是“自诸子百家之书，及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、诸小说，无所不读。”视野越来越广阔了。更为可贵的是，王安石读书求解，以自己的思考去理解，不盲目迷信崇拜，对传统文化经典有自己的独创性和批判精神，并说：“善学者读其书，惟理之求（追求的是道理），有合吾心者，则樵（打柴人）、牧（牧民）之言犹不废（听从）。言而无理，周（周公）、孔（孔子）所不敢从。”读书求通理，合于心的即使是打柴牧羊人的话也听从，不合于理的即使圣贤周公、孔子的话也不听从，这是多么大胆而具“叛逆”性的见识。王安石在学习中不泥古，博采众家之长，批判地吸取，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，苏轼曾说他是“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糠秕百家之陈迹，作新斯人”，从传统的六经中引发自己的新思想，从诸子百家的理论中独成一体，说明王安石读书学习中颇有创造性，为他后来厉行改革变法奠定了学术思想上的理论基础。

读书之外，王安石非常关注社会民情，早年的游历，使他对社会不公与百姓疾苦有一定的了解，注

重社会实践的学习，自言对于地位卑低的农夫女工，他也无所不用，从中了解丰富的生产实践知识，接近民众，对当时社会问题有较切实的认识，对百姓的疾苦有比较深切的感受与同情，这表现在他的诗中，如《郊行》：

“柔桑采尽绿阴稀，芦箔蚕成密茧肥。

聊向村家问风俗，如何勤苦尚凶饥？”

蚕农们辛勤劳作，蚕成茧肥，收获很丰，却依然食不饱腹，年青的王安石对百姓辛苦又贫困的生活充满了深深的同情。

在另外一些诗中，王安石抒写了百姓丰年不得食，灾年更潦倒的痛苦生活，对于贫富对立根源有一定的认识，认为恶吏的掠夺，豪强的兼并，政府徭役的繁重等，他们对平民百姓的残酷压榨，是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，他曾作《感事诗》，描述百姓的痛苦与豪吏的压迫：

“贱子心在野，心哀此黔首：

丰年不饱食，水旱尚河有？

虽无剽盗起，万一且不久。

特愁史之为，十室灭八九。

原因败粟麦，欲诉嗟无赇。

间关幸见省，答扑随其后。

况是交冬春。老弱就僵仆。

州家闭仓廩，县吏鞭租负。

乡邻铢两征，坐逮空南亩。”

百姓丰年挨饥，灾年更一无所有，十之八九的人家都挣扎在死亡线上。庄稼枯萎而死，百姓欲诉无门，虽说减了田赋，但催逼交税的鞭子还是落在背上，冬春之际青苗不接，老幼都冻饿而死，官府闭了仓库，县令仍催租，乡邻的田产都典卖一空，坐对荒田垂泣，是一幅多凄惨的社会景象，王安石愤愤指出这都是官吏豪强残酷欺压的结果，在《兼并》诗中说：

“俗吏不知方，掊克乃为材。

俗儒不知变，兼并无可摧。

利孔至百出，小人私阖开。

有司与之争，民愈可怜哉。”

王安石尖锐地指出，社会不公，民不聊生，贫富尖锐，都是官府官吏无能与贪婪造成的，吏治败坏，官吏为官不清正，只知任意压迫挤榨百姓，而这还被认为是“栋梁”，当政的“俗儒”不知变通，反认为豪强兼并土地是不可“摧毁”、限制的，有百姓告官司，更是没有胜的希望，百姓愈来愈可怜了。

这些诗中反映王安石关心民生疾苦，嫉恶官吏的残暴掠民与豪强兼并，立志要改革社会现状，这一切对他日后法政改革抑制豪强，提出符合百姓利益的措施有很大的影响。

在王安石19岁那年，父亲不幸壮年病逝，年仅46岁。父亲的去世，使一家人陷入了困境，家无田产，又断绝了官俸，家境很快中衰了。孤儿寡妇，无依无靠，衣食无着，往往母子相对哭泣，有时不得不到南京附近的钟山采些野菜野果来充饥。家庭的窘困使年轻的王安石很受刺激，立意要读书中举，出仕为官来供养家里。于是，在南京三年的居丧期间，安石靠了父亲的官资门荫，与两个哥哥进府学学习。因感念古贤人交友切磋道德学问，在府学结交了李通叔等意气相投的学友。李通叔生性诚笃，言行循礼如君子，容色谦和，文章不事虚华，与王安石最相得，他们互相勉励，不羨富贵，不卑贫穷，惟讲求仁义忠信的做人道德，和治国为民的学问，以安民匡世的“圣贤”相期许。后来通叔不幸溺死，年仅28岁，王安石闻知极为悲伤，亲作哀辞悼念好友。虽然后来王安石推行变法遭人垢议，树敌很多，但内心深处，他始终很重友情，笃于友爱，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。

二、孜孜实干利民生

“属闻降诏起群彦，遂日下国趋王畿。

刻章琢句献天子，钩取薄禄欢庭闱。”

这是王安石对他参加科举的自嘲。虽然在南京府学时与朋友们相励，视富贵功名如浮云，惟以圣贤作为而自许，然而面对嗷嗷待食的一家人，安石不得不考虑要解决全家的生活问题，也是“孝亲”。但他明白，不参加科举，要求一官半职来养家是不可能的，至于安邦济世也更是空话了，而安石自幼颖悟，博览诗书，文才出众，是全家的希望所在，博取功名养家耀祖，更是义不容辞。所以守丧期满，正逢朝廷科举考试，王安石决定赴京师（开封）应试，结果朝廷发榜后，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名，时年22岁，与他的父亲中进士年龄一样。可谓惊人相似，都是年少得志，但在以后的宦海生涯中却各自不同，父亲一生南北奔走，任职低微，未能尽治国安民的才干，抑郁早逝；王安石以后却官居相位，执掌国柄，推行变法，极盛一时，实现了他父亲未竟的愿望。

宋代很重视科举取士，一旦中进士就可做官，而进士高中，往往晋升更快，王安石中进士后被朝廷派到扬州任签书，淮南节度判官，在扬州知州韩琦的幕府下任职，年青的王安石初到扬州，非常思念家人，常常登高怅然望着江水，思念在金陵的欢聚生活和芳菲的景色，很有些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况味。但人在宦海，身不由己，虽然扬州与南京相距甚近，但他也不能去探望亲人，只

有寄官俸与书信，或者登高遥望。

为了排遣乡思，更为了自己的远大追求，王安石在扬州三年，利用公余闲暇刻苦读书，发奋用功，并思考着经书要义与治国之道，常常读书思索到天色破晓，才赶紧打个盹，匆忙去府办公，往往来不及盥洗和吃早餐。久而久之，知州韩琦对这位不修边幅的年轻属员产生了疑心，以为他夜饮放纵，酒色无度，一次便好心规劝王安石说：“你正年少有为，可不能废弃诗书不读，自暴自弃不思进取啊。”对此安石一笑置之，也不作解释，仍然我行我素，可见他性情耿介，不事阿谀的磊落品行。

在王安石任职扬州期间，朝廷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国家民穷财困，冗吏泛滥，农民起义与边患的不断，要求进行改革。参知政事范仲淹与枢密使富弼、韩琦等人上书仁宗皇帝，提出整顿吏治，抑制兼并土田，重视农桑，修备军事等改革主张。仁宗加以采纳，但很快遭到宰相章得象等一批朝臣豪富的强烈反对，范仲淹等人被指为“朋党”遭贬谪，这次被称为“庆历新政”的改革虽然昙花一现，但给王安石很深的印象，坚定了他不博虚名浮利，踏踏实实在地地方为民办事，体察社会民情的志向。20多年后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，他的改革思想方向与范仲淹等人的“庆历新政”很有相通之处，只是他的

变法措施更为具体明确，贯彻得更加切实，收效显著，起到了“庆历新政”未起到的作用，这显然与他务实的作风与丰富的地方官实践经验有很大的关系。

因此，在公元1045年王安石签书淮南判官任职期满后，他没有选择求试馆职入朝为官，以飞黄腾达，而是毅然要求担任地方官职，以学识经世致用。按宋代的用人制度，进士高第（前五名）为官一任后，可以向朝廷献文章诗赋以求馆职，宋代以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为三馆，直馆、直院、校理、校勘等称为馆职，因宋代馆职是辅相养才之地，入馆职被称为“进贤路”，由三馆可选为两制官（翰林学士，知制造，是皇帝秘书）。再由两制官选为两府官（中书省、枢密院），就手握重柄，鹏程万里了。这样的升官捷径也是非常困难的，多少人孜孜以求，以至皓首白发。宋代重文，时人以入馆为荣，认为这清贵荣耀，现在王安石却以进士第四名，判官一任已满的资格具备了求试馆职的条件，而以他的文才，以文章诗赋取得馆职并不困难，在这个重大抉择时刻，王安石不慕荣名，想的是以做官的机会发挥他的才干所学，不愿位居清贵无事的馆职。促使他作出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是馆职虽清贵，但收入菲薄，不足以养家；地方官地位虽低一些，但俸禄比馆职要高，而且在一般州县生活比京城费用也低得多，能更好

地照顾家庭的困难。因此，王安石毅然放弃了多少士大夫求之不得的求试馆职的机会，在1047年被派到鄞县（今浙江宁波一带）任知县，成为执掌一县的长官。

鄞县山峦起伏，依江临海，原是一个山青水秀、五谷丰登的鱼米之乡，是个民勤物丰的好地方。五代吴越国钱氏统治浙江时期，比较重视兴修农田水利，在太湖流域附近建立一套很完整的灌溉系统，并专设营田吏卒，掌管其事。鄞县也因设营田吏卒，年年修治河道，使得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，沟渠河川十百相通，而无水旱之灾，常年丰收。但是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，营田已废弛了60年多，由于历任县官都因循苟安无所作为，水道堤防日久失修，以致渠川大多淤塞，山谷流水直泻入海，多山的鄞县面临严重干旱的威胁，生产开始下降。只要天气晴朗无雨，不过十天八天，立即河床干枯，鄞县变成了最易发生旱灾的地方。勇于任事，不愿因循苟安的王安石深入察访后，决定兴修水利，彻底改变鄞县畏旱的面貌。

王安石知任鄞县第一年，适逢风调雨顺，没有发生旱情，百姓们迎来一个难得的丰收年，王安石一向不迷信，认为这并不是“上苍庇祐”，没有松懈兴修水利。他在征得上司两浙转运使同意后，便利